

“文化城市”理念的历史语境及理论内涵

王林生

摘要 “文化城市”理念的出现是世纪之交城市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在西方语境中,这一理念与欧洲一体化和城市复兴有紧密联系,在我国则与城市转型和城市创新发展相关。“文化城市”作为一个当代性范畴,在理论层面是对当代城市与文化关系的再认识。从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进程和实践来看,则构成了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和新目标。

关键词 文化城市;西方与中国;语境;内涵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化城市”理念的强力推出,是世纪之交城市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从宏观语境而言,这一理念的出现得益于文化在当代世界各国整体战略地位中的跃升,文化的繁荣成为了发展的最高目标。从微观语境而言,“文化城市”理念契合了城市转型的需要,许多城市将文化视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尽管东西方城市在整体上对“文化城市”理念选择的时代语境稍有不同,但在城市现代化、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城市”理念以其独有的特性彰显出的魅力,将城市文化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在多种形式的城市实践中不断丰富着这一理念内涵。

一 西方语境下的“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理念的历史性出场是时代的选择,

它首先出现于欧洲的文化语境中。从性质来看,这一理念的出现既是一种发展战略,受到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推动与重视,又是城市在自身转型发展中实现振兴的基本方略和落脚点。

1. 欧洲一体化中的“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理念包含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洲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下,一直进行着一体化的努力,且将文化视为一体化的重要内容。1983年希腊文化部长梅尔库丽提出每年评选一座“欧洲文化之城”(European City of Culture)的倡议,认为在“冷战”仍持续的时代背景下,文化是政治、经济之外受忽略的对象,也是消弭政治之间相互对立、经济之间相互制裁所造成隔阂的最佳方式。1985年欧洲部长会议正式启动了这项计划,并得到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响应和支持。在这项计划之下,“文化城市”理念初步显现,成为了连接东西方、团结欧洲

作者简介 王林生(1983—),男,汉族,山东莘县人,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创意城市、创意产业。

基金项目 北京市博士后工作基金项目(2013ZZ-66)。

收稿日期 2013-11-02

修回日期 2013-11-25

人民、促进欧洲文化交流与展示、营造欧洲多元文化共识的桥梁和载体。

随着计划的深入开展,文化在欧洲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欧盟在1999年正式将“欧洲文化之城”更名为“欧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针对更名之后的欧洲文化计划,巴罗佐曾指出“欧洲文化之都”是欧盟文化创造性的一面旗帜,……它的实施证明,文化在欧洲政策的可持续性发展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关系到欧洲城市和地区的长远发展,也是激活城市活力和创造力、增强社会包容的源泉;“文化是欧盟实现繁荣发展和团结一致战略目标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确保了欧盟以一种更强大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1]。这就意味着:其一,文化已成为欧洲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本,如2012年作为“欧洲文化之都”的吉马良斯和马里博尔分别举办文化艺术活动约1300场和5264场,其内容涵盖音乐、文学、艺术、戏剧、建筑和民俗等领域,体现了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活力和创造力。其二,文化是充分整合欧洲资源的重要基础。根据“欧洲文化之都”的相关章程,当选的城市不仅要改善城市本身的文化设施,而且要促进欧洲国家之间、甚至和其它地区之间文化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内容包括培养文化艺术人才、发展亲民艺术、发掘和保护文化遗产、提升城市文化生活质量等。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欧洲文化之都”成为了引导、培育、推动欧洲文化互动的载体,促进了欧洲各国的相互理解与交流。其三,文化是作为整体性的欧洲与世界对话的平台。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的文化霸权仍然无处不在,因此“欧洲文化之都”作为一项计划在城市文化性质和文化发展的层面,其意义已经超出地域性城市以及一般性区域或国家文化中心城市的概念和范畴,而是代表欧洲参与国际文化竞争,在战略上发挥增强欧洲自身的文化认同、保卫和强化欧洲的文化独立性、彰显欧洲文化共识和文化特色的作用。

因此,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城市”作为政治型和经济型城市之外的一种城市形态,既是加强欧洲诸国、城市联系的纽带,有利于文化资源的整合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文化欧洲,又承担着欧洲文化走向世界的重任,是欧洲城市参与世界城市竞争的重要方式。

2. 城市复兴中的“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理念与城市复兴有着紧密关联。如果说欧洲一体化只是对“文化城市”理念的初步

揭示,那么在城市复兴中该理念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一些深层次的内涵得以展示。

20世纪下半叶,欧洲许多城市在经历了快速发展的扩张期后,由于过度开发、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制约,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开始转移,使得城市原有的工业生产功能趋于终结,城市经济状况日趋衰败,各种矛盾逐渐显露。正是在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时,“文化城市”理念作为一种手段凸显了出来。1998年英国成立了以理查德·罗杰斯为负责人的“英国城市工作组”,在其提供的《迈向城市的复兴》中指出“城市复兴要求在文化的认识上发生转变,这种转变要通过教育、辩论、交流和参与的过程完成。文化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技能、信仰和价值观念。”^[2]可以说在这份被称为“新世纪之交有关城市问题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中,规定了城市复兴的文化导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城市复兴即是“文化城市”理念的实践。

从总体而言,以“文化城市”为发展理念的城市复兴在实践上大致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注重文化发展规划的导向性作用。

城市文化规划是对城市文化资源的整体性整合和城市文化发展方向的战略性安排,城市复兴作为一项席卷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城市运动,同样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对文化城市的发展目标、路径选择和措施保障等方面做出规划和指导。如英国伦敦作为工业化最早完成的城市,在经历了工业化辉煌之后同样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伦敦确立了以创意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城市发展路径,相继以市长的名义出台了三份文化发展战略草案《伦敦:文化之都——发掘世界级城市的潜力》(2004年)、《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2009-2012年的文化重点》(2008年)、《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文化战略草案:2012年及其以后》(2010年),逐步实现了由工业城市向文化创意城市的华丽转身,并针对维持世界创意都市地位、着眼未来城市创意文化发展、保持城市文化多样性和激发城市文化活力等问题进行了有步骤、有秩序、有重点的规划。

第二,注重文化对城市物质空间的再造。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其固有的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构筑了城市特有的空间形态和风貌。在工业社会兴盛时期,城市中规模化的工业区、码头区和工人住宅区构成了城市的特色,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

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城市逐渐失去了激活内部空间的动力。兰德利曾对破败的鲁尔工业区做过这样的描述“工业化留给鲁尔景观的环境遗患,已到了笔墨难以形容的地步:当地环境极度恶化、景观遭污染、矿渣堆积如山、烟囱直入云霄、许多鼓风机已遭弃置,还有煤气罐处处耸立。随着广泛的开矿活动引发地层下陷,导致下水道坍塌,埃姆舍尔本身已成为开放的小水道;而在状况不佳的日子里,恶臭与异味可能令人难以忍受。^[3]”为了实现城市复兴、激活城市空间的发展潜能、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文化通过以下方面对物质空间进行改造:废弃建筑的再利用;改善环境;提高城市空间的利用率,减少破坏行为,增强安全感;增强地区自豪感;开发生活、工作空间和综合性功能空间;设计团队雇员艺术家;将文化纳入未来规划^[4]。文化对城市物质空间的改造,不仅将城市工业遗迹转化为文化资本,推动了城市空间的创意性开发,改变了城市的精神风貌,而且通过文化活动的举办及其艺术设计加强了文化与城市空间环境的协调,在文化与城市的互动中,增强了城市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

第三 注重文化对城市经济结构的重组。

文化具有经济功能,在城市复兴中文化具有的经济功能不仅体现为文化已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逐渐确立了围绕文化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如赫尔辛基围绕“光之力”统筹城市经济,大力发展观光、节庆、会展等文化行业;鲁尔工业区通过工业景观再造和建筑设计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质,实现了工业城市向文化城市的转型;科隆则借助网络的力量以艺术城市的姿态迅速崛起,为城市发展辟建了新的经济领域;伦敦在面向创意城市的转型发展中,逐步确立了以创意为核心的产业组织和生产活动。作为转型发展最成功的城市之一,伦敦创意产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金融业,伦敦不仅是享誉全球的国际设计之都,还是世界三大广告产业中心城市之一,甚至拥有三分之二以上国际广告公司的欧洲总部,是世界总部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伦敦市长在市长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是伦敦的核心,正是文化造就了伦敦社会、经济和城市外在的显性形式。^[5]”可以说,通过一系列面向文化的变革,“文化城市”理念在实践中展现出了多种形式。随着文化经济日益融入现代城市,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消费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日益攀升,文化产业成长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变。

第四 注重文化对城市发展的服务性功能。

城市的复兴以文化为导向,它不仅在城市的发展中确立了文化经济的主导地位,而且充分重视城市具有的文化服务功能。文化服务以保障城市公民基本权利、满足基本文化需求为核心,能够激活城市文化资源、活跃城市文化氛围、塑造有个性的城市文化形象。如西班牙的原工业重镇毕尔巴鄂在城市复兴中通过完善文化设施成为了向文化城市转型的典范,著名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既是城市的文化地标,也是城市文化经济的重要动力。据统计,自博物馆开馆以来,毕尔巴鄂平均每年新增过夜停留游客数量779028人次,新增全职工作岗位约907个,创造的相关产值超过2.11亿欧元^[6]。由此,可以认为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在城市发展中是一种相互匹配、交互推动的关系,也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把城市文化设施作为经济目标的行为,城市也为其特定的文化进程赋予了来自更广泛的经济和区域体验所引发的激励”^[7]。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城市十分注重城市的文化服务功能,在知识型文化服务(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展示型文化服务(剧院、电影院、专业音乐厅)、娱乐型文化服务(节庆、夜总会、迪斯科舞厅),以及心灵慰藉型文化服务(宗教建筑)等方面,积极推进文化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的文化服务功能,从而释放其蕴藏的经济功能。

“文化城市”理念在城市复兴中得到了充分实践。在城市复兴的历史语境下,文化成为城市发展新的目标和动力。城市、文化与经济之间彼此联结、相互作用,处于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进程中,并展示了在文化规划、再造物质空间、重组经济结构和完善文化服务功能等层面的作用和魅力。从整体而言,文化的繁荣有助于激发城市内部的经济活力,带动城市复兴;同样,经济活动也为城市复兴中文化的生产、创造提供了动力。

二 中国语境下的“文化城市”

随着文化时代和城市大竞争的到来,“文化城市”的理念逐渐为许多城市认可,中国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亦未脱离此潮流。基于城市文化保护和实现城市创新发展的目的,我国不仅制定实施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年)等相关文化政策,还从198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评选“历史文化名城”,至今已有三批共118个城市获此殊荣。近些年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

围绕文化城市发展,纷纷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确立了文化城市的发展目标和路径。相对而言,我国对“文化城市”理念的理解与实践,既秉承了“文化城市”理念的某些特质,与欧洲城市的文化转向具有内在一致性,同时又结合了我国城市文化的现状和历史,展示出了一定的特殊性。

中国语境下“文化城市”理念的内涵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从历史上看,我国是文化最繁盛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许多城市在文化方面具有世界影响力。近年,我国将文化强国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予以突出强调,并认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城市是国家的载体,城市承担着国家、民族复兴的重任。近代史的经验也证明城市的崛起往往标志着国家的崛起,纽约之于美国、东京之于日本、伦敦之于英国莫不是如此。因此在这层意义上,“文化城市”理念是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它的实施与成效不仅决定着城市的荣枯隆替,也与中华民族的兴衰际遇息息相关。尤其是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文化及“文化城市”理念的重要性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成为了不可回避的历史命题。

第二,参与国际城市竞争,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认为其是国家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之外的一种国家实力。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家与国家的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而且这种竞争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城市之间,即城市间的竞争逐渐代替了国家间的竞争,如奥运会、世博会、园博会的举办城市之争等。在城市大竞争的世纪,城市特别是世界大都市之间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成为了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文化优势已经成为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表现。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哈尔滨等申请“世界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美食之都”、“音乐之都”等,都是紧紧依托城市特色文化资源,着力于塑造个性鲜明的城市文化品位、品牌和形象,并以此来提升城市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这不仅是以优势文化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途径,也是践行“文化城市”理念、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形式。

第三,推动城市发展转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前,城市转型是我国城市发展中最为紧迫的任务。在经历了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环境等基础性要素已受到极大的消耗和破坏,城市面临发展危机。对此,《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走到了尽头,也是中国城市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8]。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消费社会和网络信息社会的来临,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即由原来的以二、三、一为次序的产业格局逐渐向以三、二、一为次序的产业格局转变,以文化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上升,并逐渐取代了第二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首要地位,城市的命运也越来越多地与文化资源、文化产品和知识资本联系在一起。因此,从我国城市发展实际和国际经验发展趋势来看,“文化城市”理念的出现是推动城市创新发展和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文化与科技融合性发展的推动下,一些文化新业态如设计创意、动漫游戏、数字出版、新媒体等,在城市文化经济中发展迅速,进一步推动或增强了文化产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支柱性地位。

第四,完善城市文化服务,繁荣城市文化生活。

繁荣的城市文化生活是城市充满活力的根本保障,它需要有完善的城市文化设施、配套的文化服务来支撑城市的文化消费。由于在我国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实施的是外向型经济和投资拉动战略,对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投入的重视度相对不足,使得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矛盾。以北京为例,在9项文化设施的对比中,公共图书馆、美术馆、剧院、音乐厅、节庆活动、宗教建筑等项,无论是在总量还是人均平均占有量方面都不及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四大世界城市,只有博物馆、电影院、夜总会、迪斯科舞厅的数量具有领先优势(表1)。可以说,文化设施的严重不足成为制约城市文化发展和文化消费的重要短板。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文化消费额为1101.74元,仅占居民人均消费总额的7.2%,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则在10%左右,如芬兰为11.30%、丹麦为10.94%、英国为10.76%、荷兰为10.02%、加拿大为9.85%、美国为9.23%、德国为8.94%、法国为8.37%^①。显然我国文化消费在整个消费支出中的

比重偏低,而这与城市文化设施不足有一定关系。国际一般认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便进入井喷期,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上时文化消费将有爆发式增长。2012年我国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表明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有所提高,文化消费将成为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在

此背景下,“文化城市”理念的适时提出与实践,既是弥补过去文化发展欠缺、加快城市基础文化设施建设的契机,也是立足于当下,创造能够丰富城市文化生活、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平台和载体,更是着眼于文化服务和文化消费在未来城市发展中的变化和地位,提升城市文化发展水平的关键。

表1 北京与世界主要城市文化设施一览表

指标		纽约	伦敦	巴黎	东京	北京
1. 公共图书馆	数量(座)	220	383	830	377	25
	每十万人图书馆占有量	3	5	7	3	0.13
2. 博物馆	数量(座)	131	173	137	47	162
	国家级博物馆数量(座)	5	11	24	8	84
3. 美术馆	数量(座)	721	857	1046	688	192*
	人均参次数(含博物观)	1.9	3.2	2	0.8	—
4. 剧院	数量(座)	3752	214	353	230	68
	每年表演的场次	43004	32448	26676	24575	11625**
5. 电影院	数量(座)	117	108	302	82	126
	银幕数量(块)	501	566	1003	334	676
	每百万人占有银幕块数	61	73	85	25	33
6. 专业音乐厅	数量(座)	15	10	15	15	4
	每年表演的场次	22204	17108	33020	15617	1475***
7. 节庆(个)		309	254	360	485	150****
8. 夜总会、迪斯科舞厅(个)		584	337	190	73	818*****
9. 宗教建筑(座)		50436	13974	9255	90433	114

说明:第1、2、3、5、6、7、8项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数据参考 World Cities Culture Report 2012;第9项数据参考《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红旗出版社2012年);北京数据主要参考《2012北京统计年鉴》;其中北京美术馆数量为美术馆、艺术馆和画廊的总和,数据来源于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专业音乐厅每年表演场次来源于《北京市演出市场统计与分析》;北京节庆数量参考《北京节庆排行榜出炉 八成人热衷参与节庆》,来源于新华网;北京夜总会、迪斯科舞厅数量为《2012北京统计年鉴》公布的娱乐场所数量(不含电子游艺厅、网吧等)。

综上,“文化城市”理念及其实践既体现了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参与国际城市竞争,积极进行文化转向的时代发展潮流,又体现了我国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城市发展内在机制创新,谋求城市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文化城市作为我国城市发展的新主题,有利于在城市文化的发展中探索出一条既保障文化的公益性,又充分注重文化的市场性,既坚持艺术原则,又兼顾市场原则的发展之路,对推动城市文化的协调、有序、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三 “文化城市”理念的理论内涵

前已述及,“文化城市”已然是践行在中西方城市发展中的理念,作为特定语境中的特定理念,它反映了不同城市社会经济的客观条件和整体状况,展示了“文化城市”理念不同层次的内涵。从总体而言,作为一种主导时代发展的价值观念,其理论内涵

大致可以从理论本身的发展逻辑和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进程这两个层面来进行阐释。

1. 作为理论形态的“文化城市”

从理论形态的发展逻辑来看,“文化城市”是一个当代性范畴,是对当代城市与文化关系的再认识。城市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文化城市作为融合着城市与文化双重因素的产物是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议题。芒福德等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发挥着贮存、传播、交流、创造和发展文化的作用,而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质的内在规定。“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9]。由此,芒福德在人类文化的证据上阐释了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腊—罗马文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近代工业文明等语境中的城市发展。但在严格意义上讲,这里所言及的文化城市仅仅是发掘了以往城市研究中被忽略的文化层面,或者多侧重于城市文化形态的研究,并未将

文化城市置于城市唯一或绝对主导性的位置。

如果说在以往对文化城市的研究中,较为重视文化与城市起源、发展的关系,更多地是追溯文化城市的历史源流和发展脉络,那么作为当代的文化城市理论更多关注的则是作为目标定位和功能的文化城市,是对当代城市与文化关系的重新阐释。

日本学者矶村英一在对文化城市进行界定时突出其作为文化定位的内涵,指出“较多地保存了文化财富的历史城市,或建设了近代的文化设施的城市,称之为文化城市。这类城市,又多属于观光城市或学园城市。并且,与人们常常用文化这个词一样,所谓文化城市,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化水平高,常常是作为城市建设的目标”^[10]。与矶村英一不同,左大康侧重文化城市所具有的文化功能,认为文化城市是“以宗教、艺术、科学、教育、文物古迹等文化机制为主要职能的城市”,按文化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宗教型城市、艺术教育型城市、文明古迹型城市等^[11]。从总体来说,强调目标定位的文化城市与强调功能的文化城市二者并不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只有文化功能完备的城市才能称之为文化城市,而文化城市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城市文化功能的充分发挥。易言之,文化城市视域下,仅探讨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是没有意义的,它更重视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城市发展中具有的核心性地位。正因为此,加拿大学者谢弗指出,随着文化时代的莅临,在当今城市及世界未来的发展中文化是一支关键力量,“文化和民族文化应当成为社会的中心内容,成为城市、地区、国家和国际发展的主导内容”^[12]。所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文化城市”理念的当代性与以往研究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研究的重点和文化的功能定位上。以往的研究大致是在城市的载体上研究文化,城市仅是文化的一种“容器”,而当代的文化城市研究则是在文化的载体上研究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当代语境中的文化城市研究在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和实践路径上深化了文化与城市的关系,加强了以文化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构成和社会服务,凸显出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主导性功能。

2. 作为城市发展新阶段的“文化城市”

从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进程来看,文化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在宏观层面上,城市的发展经历了区位型、资源型、投资型等为主要驱动力的发展阶段。在这些发展阶段,文化仅仅是处于一种从属性地位,与文化相关的文化生产活动在整个城市经

济发展中的地位微不足道。但城市的发展转型,以资源和投资拉动经济发展方式的穷途末路,为文化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里之所以说文化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主要是因为文化城市的理念及实践体现出以下特征。

其一,当代文化城市的发展高度依赖文化与创意,以探索出一条内生型的发展模式。内生型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当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它着力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在长期的发展中以自然资源、投资等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但资源的枯竭、资金链的断裂往往成为城市发展的制约。相对来说,文化与创意却是城市发展取之不竭的资源,因为文化转向中的城市发展推崇现代创意对城市内部蕴藏的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强调文化艺术和创意人才对经济的支撑与支持,借助于城市自身的文化资源、创意资本、文化生产、文化消费等实现城市发展的持续。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物质化产品形态相比,“文化城市”理念下的产品偏重于精神性的生产,具有符号性、象征性的特质,具有较高的经济附加值。文化城市的发展路径表明,它不同于过去依赖区位、资源和投资的发展模式,而是充分依赖城市自身的文化潜能和创造力,将文化和创意视为城市发展的核心与动力,是一种自然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发展模式。

其二,当代文化城市注重文化业态对城市的贡献,文化产业成长为城市经济增长的支柱型产业。发达的城市文化经济和丰富的城市文化生活是文化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它不仅顺应城市内生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发展转向的必然诉求。在文化城市中,以影视制作、出版发行、演艺娱乐、会展节庆、广告设计、休闲旅游、信息服务、软件开发、艺术品交易、咨询策划等为代表的文化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如纽约尽管只有几百年的建城史,但以“百老汇”为代表的文化活动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2012年以百老汇音乐剧为核心的时报广场经济圈年度营业总额逾1100亿美元,占全市年总产值的18%,文化娱乐业已成为纽约市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支柱型产业,也正因为如此市长布隆伯格指出:文化“是纽约保持世界最伟大城市之一地位的基础”^[13]。文化产业对城市的贡献,说明文化的潜力和创造力已得到挖掘和展现。尤其是随着我国一些城市提出“文化强市”、“文化立市”等理念,城市发展在我国已具有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作为一种核心要素在城市诸要素构成中逐步获得了发

展的优先性。

其三,当代文化城市强调文化与科技、经济的融合,注重多种要素的一体化发展。在文化城市的发展中,虽然文化在多种要素中的位置被前置,但绝非意味着文化与科技、经济绝缘。相反,当代城市中文化的根本理念是通过“越界”达成与其他行业或领域的“融合”的,即文化城市所注重的文化是一种科技的文化化、经济的文化化,而文化城市在实践中,也正经历着文化的科技化、经济化。正如谢弗指出的“正如文化时代的形成需要结合经济时代和其他许多因素一样——这种结合源于文化时代固有的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和更加根本地对生命、生活、现实、发展,以及世界体系的认识——经济时代的支配力量也将被结合并且受制于文化时代的关键要素,而不是受到这些要素的排斥。^[14]”也就是说,文化之所以能够融合其他行业和领域,一方面在于文化本身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在文化城市中文化发挥着一种导向性作用,具备统筹一切社会发展因素的能力。文化与科技、经济等要素融合后的一体化发展,不仅是城市文化产业提升竞争力和实现产业升级的根本途径,也是增强城市自身文化软实力和硬实力的重要手段。

可以说,文化城市的理论内涵是丰富的和多元的,它彰显了这一理念在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开放性和包容性。在本质上,文化城市是一种不同于资源型、工业型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体现了时代的发展特征和文明的发展高度。它以文化为中心对城市的构成要素进行重新整合与转换,构建一个以文化和创意为内生动力、以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体验为产业终端、以城市文化服务和文化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文化生态,是融合着传统与创新、物质与精神、科技与经济,以适合人的生存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型城市理念与形态。

四 结语

总体而言,当代城市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内外环境、主客观等复杂条件为“文化城市”理念的历史性出场奠定了现实和理论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它建立在世界不断寻求变革的城市发展基础之上,并因这些城市特定的文化基础而具有不同的实践形式,在新兴的全球城市文化体系中以无数未知的方式存在并进行着互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化城市”理念的历史

性出场,意味着文化在支撑城市发展的诸要素中被置于“前突”的位置。文化与城市的关系逐渐成为理论探讨和实践的焦点,成为城市发展的时代命题。

【Abstract】 In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cities have witnessed the appearance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ity”, which is a major event in city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ontext, this concept is closely related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urban revitalization, but it is related to 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in China. “Cultural City”, as a contemporary concept, reconsid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ities and their cultures on theoretical level, while, on practical level, forms the advanced stage and new goal of c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cultural city; The West and China; context; connotation

注释

① 中国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站,欧美国家数据参考《国际统计年鉴 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参考文献

- [1]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pean Capitals of Culture: the road to success from 1985 to 2010 [R].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9: 1
- [2] Urban Task Force. 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 [R]. Urban Task Force, 1998: 5
- [3] 查尔斯·兰德利. 创意城市 [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149
- [4] G. Evans and P. Shaw. The Contribution of Culture to Regeneration in the UK [M].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2004: 19
- [5]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London Cultural Capital: Realising the potential of a world-class city [R].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2004: 11
- [6] 西尔克·哈里奇,比阿特丽斯·普拉萨. 创意毕尔巴鄂: 古根海姆效应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2(3): 11-16
- [7]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文化 [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358
- [8] 刘治彦,付晓东.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评价与展望 [R].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41
- [9]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91
- [10] 矶村英一. 城市问题百科全书 [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176
- [11] 左大康. 现代地理学辞典 [M]. 商务印书馆, 1990: 731
- [12] D. 保罗·谢弗. 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84
- [13] 李大玖. 纽约的金字塔文化投资 [N]. 团结报, 2013-08-24
- [14] D. 保罗·谢弗. 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85

(编辑: 丛琳; 责任编辑: 辛章平)